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

主持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文溥

参加者:

戴亦一:厦门大学计统系副主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林 枫: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张明志:厦门大学国际贸易系讲师、在职博士生

孙建国: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李文溥:近十来年,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先是在国外经济学界,接着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注意。东南亚金融风波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持续而深刻的影响,更使众多中国公众从切身经历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1998年,我到福建一个曾是中央苏区的边远山区小县,县委书记和我谈起了东南亚金融风波对该县经济的严重影响,深切感叹当今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是如此密切联系,当年路隘林深苔滑的山区小县的经济也随着世界经济的大潮涨落而动荡不已。现代科技进步,尤其是通讯与信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使我们生活的地球迅速地“缩水”了。过去彼此隔绝的各个民族正在成为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休戚与共的居民。它在经济上的反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强弱,其经济都越来越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今天,我们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回顾中国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迅速的进步,是中国人主动选择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一致的发展道路的结果,同时也与这20多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以引进外资为例,中国虽然在

1980年就设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商投资(FDI),但是,FDI的第一次高潮是到8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它与近20年来世界范围的FDI高潮是同步出现的,1980年-1985年,世界的FDI流量年均增长速度仅3%,而1986年-1990年剧增到23.6%。进入90年代以来,世界的FDI流量每年都以接近20%的速度递增,为我国90年代的第二次引进外资高潮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负面影响,可以举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波为例。为了消除东南亚金融风波对中国经济发展叠加的消极影响,我国政府自1998年开始实行扩大内需政策,政策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中国经济一直到2000年,东南亚国家步出金融危机泥潭之际,才出现重要转机。我们完全有理由预料,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中国加入WTO,在新世纪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因此,我认为,不仅世界经济的研究者,而且是每一个经济学者,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是从事实际经济工作的同志都应当关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戴亦一:对于经济全球化,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它对世界经济以及个别国家经济的影响,是利大于弊还是

弊大于利?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显然要比在国家或区域范围内来得更有效率。对于这一点,最简单的理解方法是逆向思维法,即只要设想哪一天你所在的城市突然间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经济联系,那么这个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或人们的生活水平将会变得怎样呢?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反证。当然,即使从资源配置的主体层面,即从全球化对企业的效率影响上看,也不难明白其中的道理。对企业来说,经济全球化至少可以为它提供三个新的机会:第一,经济全球化可以让企业有机会充分利用本身独有的核心技术或市场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范围内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回报——这显然有助于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二,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使得企业将其价值创造活动,分散在全球范围内效率最高的地点进行,从而实现地点经济(Location economies);第三,经济全球化还可以使得企业借助经验效果特别是规模经济效应,实现经验经济(Experience-curve economies),从而减低营运成本,创造新的增值方法。

总之,经济全球化对于改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认为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逆转的潮流的主要根据之一。

李文溥: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整体影响主要是正面的,这一点大体上没有争议。具体到对各国经济的影响,看法就比较复杂。应当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扩大优化资源配置范围,参与国际竞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是有利于本国经济增长的。世界银行对41个国家1963-1985年实行的贸易政策类型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指出,实行强烈外向型政策的国家,其1963-1973年,1973-1985年的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6.9%和5.9%,中等外向型国家分别为4.9%和1.6%,中等内向型国家为4.0%和1.7%,强烈内向型国家仅为1.6%和-0.1%。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对提高各国经济效率的作用。问题在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经济增长成果是如何分配的。

戴亦一:当然,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即蛋糕做大),与这种福利最终将由谁来分享(蛋糕怎么切),毕竟是两码事。即使在国家经济体系中,效率的改进与财富的公平分配之间,也是存在着内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全球化条件下的这种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经济环境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而且,在很多情形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一方面,在国家经济体系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还可以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手段来加以调节,但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中,由于国与国之间缺乏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这种调节则是很难实行的;另一方面,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整体效率差异,比起一国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整体

效率差异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在“赢者通吃”的数字经济时代,这一问题将尤为突出。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处理好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否则,该问题将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在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全球化’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全球化’意味着剥削和肮脏的东西”。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全球视野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无疑将是相当严峻的,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力求在充分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改进机遇的同时,积极呼吁世界各国关注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积极倡导建立全球财富再分配机制,争取一个“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李文溥: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全球化市场的组织协调问题,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全球化的市场力量把过去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国家疆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与组织协调的平衡打破了。

孙建国:从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给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提出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甚至动摇了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的基础,这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全球化增加了各国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进入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全球大部分国家的选择,这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全球的贸易、投资和资金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1990-1997年世界GDP增长了39.65%,而世界出口却增长了62.33%。在发达国家中,进出口占GDP的比例在1987年到1997年的十年间从27%上升至39%,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在同期从10%上升到17%。从投资方面看,从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中,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1920亿美元增长到6100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外国投资在GDP中的比重都上升了,从资金流动上看,全球外汇市场平均交易量从1983年的每天600亿美元上升至目前10000多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日益脱离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成为有自身运行工具、运行规律的虚拟市场。在这种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以巨大规模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受外部的影响越来越大,一国的经济稳定不但取决于本国的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经济繁荣状况,取决于所吸收的直接投资能否持续增长,也取决于周边国家的经济、金融局势的稳定。从9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情况看,尽管没有发生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但地区性经济、货币、金融危机有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

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在1980年的经济泡沫破裂后历经整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危机。这些危机往往像传染病一样迅速地蔓延到周边的国家,即使后者采取了控制国内宏观经济的措施往往也无法抵挡和幸免。总的来说,全球化增加了各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需要各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加强宏观经济管理。

2. 经济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传统的观点认为,国家通过适当的财政、金融措施的组合调节社会需求,以实现本国经济的对内、对外均衡。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上理论正遭受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首先从财政政策看,为了吸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直接投资,东道国不但要支付庞大的费用用于土地、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还要给予投资者超国民待遇(主要包括减免所得税以及部分费用在税前列支),在此情况下为了维持本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水平,可供选择的只有向本国的劳动者增税以及走向金融市场举债。在政府的债务达到一定规模以后,政府的举债能力和举债规模就受市场控制。穆迪公司的各国信用评级报告不但影响各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筹资成本和筹资规模,甚至限制了筹资国的财政政策空间。从金融政策上看,一国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利率、汇率和货币供应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无论哪一种工具的作用都必须考虑外部因素的干扰,如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方法来刺激需求,但国内外利差达到一定程度就将促使本国居民纷纷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外币以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从而抵消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安排。更为典型的是在1992年的英镑危机中,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者战胜了英格兰银行,迫使对方放弃了维持英镑的努力。

3. 全球化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安排压缩了一国政策选择的自由空间,造成国内政策和国际制度安排之间的矛盾,甚至造成社会冲突。随着区域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体系,如欧盟、WTO、IMF、世界银行。这种制度安排有助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秩序的形成,但却使主权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造成社会冲突。如1992年欧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加入欧元的国家必须在1998年底将财政赤字压缩到财政支出的3%以内,当时法国这一指标是5%,财政支出的减少加剧了法国原本严重的失业问题,引发了1995年底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产生了1968年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接受IMF援助的国家因不得不接受IMF苛刻的经济调整方案,招致国内激烈批评,在印尼这甚至成为暴乱和总统下台的导火线。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种全球性的制度安排体系面

前,主权国家并无太大的选择空间。

林枫: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存在着贸易关系上和技术发展上的不平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同在。不开放,生产力无法发展,开放,跨国生产力又带来巨大冲击,存在着很现实的国家主权问题。国家主权不能抛弃,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应当有所扬弃,一国必须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更大利益,存在一个付出与所得的考量。

李文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20世纪的国际发展实践都可以证明,从经济全球化退回到闭关锁国无论是对世界经济还是各国经济的发展,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选择。因此,建立一个与全球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是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从理想角度出发,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当与全球化生产力相适应,而且能够在世界各民族,各社会阶层之间合理地分配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而现实中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过程,相当程度上是各国较量实力的政治过程。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政府不能不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国际经济制度安排,为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争取相对有利的空间。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如何提高经济的竞争力?20余年来,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调整对我们不无启发。

孙建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率先抛弃了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随之跟进,而德国、法国、日本等却迟疑不决。经过十余年的调整,各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竞争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OECD的研究,1967-1991年,德国、日本的总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领先,而到了1992-1995年,却落到了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最后。德国甚至不及OECD欧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3,而1967-1991年远远低于日本及美国,1992-1995年却成为总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据OECD的研究,1980-1991年,G7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排序是:日本、加拿大、西德、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而1992-2000则转为:加拿大、美国、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竞争实力的恢复,与其实行加强竞争促进竞争力提高的政策,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实现了突破,带动了产业升级和转型,是分不开的。最近,国内经济学界对美国“新经济(New Economy)”尤其是其中的信息技术革命十分重视,但是对“新经济”中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制度层面的变化却不够重视。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主编谢泼德(Stephen B. Shepard)则指出,“新经济”是指近几年正在发生的两大趋势:一是经

济全球化,二是信息技术革命。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所引起的制度政策层面的变化是值得国人注意的,例如美英等国根据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在传统的国家所有或管制的自然垄断部门实行的私有化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就大大提高了这些部门的经营效率从而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据OECD的研究报告,在电力行业,日、英、法、德的人均效率仅为美国的0.767,0.299,0.465,0.267;在电信部门,则分别为美国人均效率的1.25,0.87,0.64,0.71;在民航业,这些国家的人公里座位成本分别为美国的2,1.167,2.667,2.167倍;在银行业,按照美国花旗银行的效率标准,德国和奥地利7家银行的平均冗员率竟达79.66%!工业发达国家尚且差距如此,我国的差距就更大了。有资料显示,这两年我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在世界上呈下降趋势,至今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的比重甚至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我认为,鼓励竞争,促进创新,提高有效供给能力,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加入WTO后,受威胁最大的行业如汽车、金融、电信、民航等恰恰是国内政府保护最多的垄断性行业。因此,对这些行业要坚决实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增强它们的竞争能力。

李文溥:提高国际竞争力问题近年来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广泛注意。这是好事。如何提高竞争力却存在不同方法。一种是立足于“竞”与“争”。通过调整完善竞争法,大力推进竞争政策,通过加强竞争促进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在更大范围形成统一市场,创造公平、平等、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就成为重要的政策手段。欧盟近年来在促进欧盟范围统一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督促各成员国调整竞争法,逐步向欧盟标准靠拢:规范各国的产业政策及国家补贴,要求政策及补贴必须透明化;对各国传统的国家垄断及管制部门,欧盟虽然没有规定统一的所有制标准,但是大力督促,甚至不惜施加压力促请开放,实施自由竞争,强调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竞争,并将其纳入一般的竞争规范管理范围。为打破固有垄断格局,促使竞争结构早日形成,不惜采取了以优惠政策鼓励新进入者,同时对现存垄断性企业赋予更多社会义务的逆补贴政策。欧盟要求至1998年欧盟所有的国家垄断及管制部门如电力、电信、民航、公路运输及流通等均应实现自由化。与此同时,在相当多OECD国家中,竞争政策也受到了空前重视。据OECD1993-1997年发表的各年度报告《OECD国家中的竞争政策》(“Competition Policy in OECD Countries”)中的资料,1990-1994年,就有17个国家制定或生效了新的竞争法,26个国家对现有竞争法做了重大修改,22个国家提出修改竞争法,欧盟及6个国家提出了实施竞争法的指南和细则。目前,除OECD及欧盟外,尚有20多个国家逐年发表本国竞争状况报告。另一种方法是立足于

“保”与“守”,企图通过限制竞争以守住既有优势。它表现为:用倾斜政策培养“国家冠军”,以行政手段扶植“航空母舰”,甚至在竞争性领域组建国有垄断性大公司;在生产能力过剩部门组织价格卡特尔,限制竞争,向消费者转嫁亏损;无视某些国有经营部门因现有体制弊病造成的严重低效率、官商作风及不正之风,对某些产品的经营恢复国家垄断,等等。

林枫:这两种方法反映了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思路。其优劣利弊,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造成了国人的自闭意识,明清以来,封建王朝为维护其统治需要,长期闭关自守,对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采取了限制的政策。明代中日贸易屡遭严禁;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正常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清代前期,“寸板不得下水”;鸦片战争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只限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限制也越来越严;鸦片战争失败,国门被打开,中国被列强强行拉入世界经济的圈子,接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辐射,但是,相当长时期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拒绝向外国的先进文化技术学习,铁路、近代机器制造业都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即使是所谓的洋务派,也不过是中体西用而已,在思想深层仍然是拒绝开放,抵制外来先进文化的核心,郭嵩焘《使西纪程》仅仅因为称颂西方物质文明而遭毁版。其结果如何?只是使中国在世界史上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痛失机会而落伍;相反,我们的东邻日本,鸦片战争之后10年,美国的伯利舰队入侵江户湾,迫使日本接受了类似的不平等条约,之后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日本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却引发了明治维新。经过数十年的认真学习和努力革新,使当时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处类似地位的日本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大体完成了现代化。时隔半个世纪,1895年,当年同是积贫积弱的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满清王朝,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战胜沙俄,从而奠定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日本在崛起之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不足取的,但是,起点大致相同的国家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的不同命运却值得我们深思。时隔一个世纪,全球化浪潮再次席卷全球,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我觉得,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以何种心态面对经济全球化。

张明志: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国的开放从其内容上看主要是推进贸易(包括投资)的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核心在于市场机制的形成和确立;而贸易自由化则致力于国际贸易障

碍的清除,其重点在于推进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化。二者的目标都在于促进经济资源在国内外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目标和内容。它们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政策着眼点的不同,经济市场化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着眼点主要在于国外市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时展开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也是同步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和深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将加快。

世界银行曾经指出,对于经济体制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国家,应该先进行经济市场化,后贸易自由化。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外部的强势竞争,或者在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同时进行的过程中,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要快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上看,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市场化不仅是同时进行的,而且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要慢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这似乎有悖于世界银行的忠告。然而,这也许是中国贸易自由化目前面临着严峻考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中国不能等经济市场化完成之后再走向贸易自由化。实践证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和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形势又要求中国只能加快贸易自由的进程,而不能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中国,经济市场化的滞后已经在阻碍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最为明显的是,中国国内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态势,它直接影响到中国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在市场经济国家,贸易自由化不存在体制障碍,但体制障碍目前在中国却成了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最大阻力。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这一背景下,中国不仅要加快贸易自由化进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加快经济体制的转轨,快速推进经济的市场化。只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快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才能实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协调发展。

李文溥:与贸易自由化相联系的是引进外资问题。1992年之后,我国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领域和范围。外商投资继80年代以绿地投资,兴办独资、合资新厂为主,转向了绿地投资、兼并、收购国内企业及证券市场投资多种方式并举,投资来源从过去的港澳台侨资为主,中小外资为主转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逐渐增多,等等。面对外商投资的新特点,我国经济学界曾再度引起争论。针对扩大引进外资的领域与范围,有人提出,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已经相当高,完全可以领先依靠本国的储蓄满足投资积累的需要;针对跨国公司在国内的投资增加,有人提出今后应当鼓励中小外商投资,抑制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针对外商投资方式的多样化,尤其是对国内企业的兼并、收购,有人提出必须对民族工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实行保护,等等。这些问

题实质是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趋势以及我们可能的选择。如果不是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竞争性优化配置而是以“两缺口模式”来看待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会得出一国的储蓄率高到一定程度就不需要外国投资的结论,至于那种应当鼓励中小外商投资,抑制跨国公司的对华投资的看法,可以说是对跨国公司在世界投资、生产、流通、以及技术创新技术贸易的地位基本不了解,仅就技术而言,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与投资司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工业研制的80%、生产技术的90%、世界技术转让的75%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世界技术贸易中70%以上的收入和50%的支出属于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范畴。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跨国公司的投资,也就意味着相当程度上拒绝吸收可能获得的国外先进技术。至于一度呼声很高的保护民族产业提法,我以为也是值得考虑的。从理论上说,要靠保护才能生存的东西永远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政策上完全否认对国内幼稚产业的必要保护。

张明志: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这一对关系意义重大。

理论上,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直至现代的贸易理论,基本上是以自由贸易(Free Trade)作为其规范研究的基准点,并集中体现为自由贸易理论,其最重要的规范结论就是,自由贸易是最佳选择,它的政策含义就是政府应实施零干预或不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所以,自由贸易理论为各国实施贸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自由贸易理论是最优的这一结论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假定前提之上。例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生产函数呈现常数规模经济,没有动态规模收益及其他动态效应;不考虑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其他非经济的政策目标,等等。显然,这些条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以上假定的不成立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就一定优于自由贸易,但是,这至少表明,在理论上贸易保护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空间。

理论研究表明,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在长期内会由于引进竞争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使单位成本下降而有利于广大消费者,即从一国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贸易自由化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从现实上看,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世界市场逐步形成,生产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流动在加快,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在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为各国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动力。此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协调运作

以及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及运转,更是为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和制度方面的促进因素。

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对贸易自由化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价值判断,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即使是都赞同应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国家,在具体实践中却不一定真正地或完全地推进贸易自由化。这集中地表现在各国在进行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贸易保护甚至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无论就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而言,还是对本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参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都是必然趋势。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贸易保护的合理性,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加快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进一步发挥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排除贸易保护。问题在于,中国在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如何使合理的贸易保护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比如,如何选择并有效地运用贸易保护手段;如何使贸易保护适时并适度;如何使贸易保护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符合WTO的准则要求,等等。

中国只有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框架和大趋势下,坚持不懈地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同时考虑如何使合理的贸易保护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而使中国的贸易发展既符合世界经济的大潮流,又为中国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争取有利的时间和空间。也许只有这样,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才能做到趋利避害。

李文溥: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是
国家经济安全。这些年来,论坛上对这个问题讨论较多。

戴亦一:我认为,中国必须直面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这是我们无法抗拒的现实选择。同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新的国家经济关系体系中,也必须受到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这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一些学者之所以对中国争取借加入WTO的契机,以尽快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持有保留意见,原因之一正是出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顾虑。应该承认,全球化必然会打破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原则与架构,因此,新的国家经济安全现状显然将无法符合旧有的经济安全原则。但是,我认为,我们不能再以是否符合传统的国家经济安全原则为标准,来判别中国是否应该积极响应经济全球化的召唤,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国家经济安全概念与原则的变革,只有找到了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

主权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石,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在一个愈来愈相互依赖的全球化世

界里,领土、独立与不干预的意识已失去部分意义,不能再作传统的理解,否则国家将难以接受全球化社会的新变化。具体而言,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全球化意味着在某些领域,特别是与全球共有的,如某些全球性的环境保护、打击某些全球性的经济犯罪等,主权必须集体行使。因此,全球化意味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必须让渡给某些国际机构共同行使;第二,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必须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概念作出某些修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主权的最大威胁可能源于国家内部,那种认为外来的军事力量或经济殖民地威胁主权这种看法已逐渐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主权的让步是一个内部的决定,而且通常是出于改善经济或竞争力的理由而引起的。例如:欧盟成员国出于增强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的考虑而加入欧盟(EU)这样的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代价就是放弃其部分货币政策权、关税政策权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主权。而有些国家即使只在特定情形下(如金融危机期间)接受国家货币基金(IMF)的援助,也不得不放弃其部分经济政策权,而采取某些IMF形式的经济管理政策;第三,全球化意味着全球管治系统必须重组。传统上管治大体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但现在已被理解为同时也与民间机构、国际企业、全球资本市场和全球大众媒介有关。联合国创立之初,成员国是最有影响力的,而且竞争对手甚少。但现在他们要面对大型商业机构、企业联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政府,以及国际资本市场的抗衡,而且,政府本身也较以前更多依赖市场机制,并日趋倾向于以全球社会的法则去制衡政治或军事霸权的规则。因此,市场力量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之间的事务,将成为全球化时代全球管治的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不能再将其单纯视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

面对全球化条件下上述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传统观念的变化,我认为中国应该重新建立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评估原则与方法,并据此进行决策分析。否则,我们将很难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李文溥:你涉及到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无法选择的现实,可以选择的只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我注意到,今天在座的诸位都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提到这一点。足见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被动地卷进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而当时的主流社会心态是抗拒全球化,结果演出了一场悲剧。我想,今天,时隔一个世纪,当全球化的浪潮再度掀天而来时,具有新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当以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扬帆出海,弄潮于世界,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正剧。